

◎ 止庵 著

插花地册子



小时读书
创作生涯
师友之间
读小说
读诗
读散文
思想问题
如逝如歌
骊歌
月札
日札
挽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畫花地冊子

◎ 止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花地册子 / 止庵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9

ISBN 7-80713-179-9

I. 插... II. 止... III. 读书笔记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8199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042 (传真)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6.75 印张 34 幅图 1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我应承下这个题目，整整拖了一年不曾动笔。实在是很难写。原因有二，其一是要写自己的事情。我一向认为世间什么都可以一谈，惟独自己的事情除外，因为容易搞得“像煞有介事”。记得有一回和朋友谈起，文艺复兴的流弊之一就是人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而几百年来欧洲以至世界上的乱子大多由此而生。看清楚这一点，大概可以引为鉴戒，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觉得这未免可笑，也很可怜。再说读者多半是不相识的，凭什么不先请教一句想听与否，就把你那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情说个喋喋不休呢。天下事怕的是自己饶有兴致，而别人索然无味。话说到这里，似乎牵扯到意义上了，殊不知此点最难确定，把有意义的看成无意义，因而不说，倒还无所谓，顶多只是遗漏，而古往今来遗漏的事情多了，最终一起归于寂灭而已；麻烦的是把无意义的看成有意义，岂不成了一桩笑话了。废话说了许多，终于还是要写，并不是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也不是一向视为无意义的忽然变废为宝了，道理其实只有一个：既然说过要写，那就写罢。只是有些太个人化的事情可以忽略不提，而且知道即便写下来的也没有什么价值，不免换个态度，至少无须装腔作势了。好有一比是明知

自家摊儿上只有萝卜白菜，就用不着像卖山珍海味似的起劲吆喝了。当然有会做买卖的，能把萝卜白菜吆喝出山珍海味的价儿来，可惜我没有这个本事，而且总归还是心虚，不如尽量藏拙为幸。

其二是要写童年的记忆。查《现代汉语词典》，“童年”是指“儿童时期，幼年”。这大概就是说年龄，真要如此我可就写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我在那个岁数差不多没有记忆。有个办法是混水摸鱼，把后来的事情偷偷儿地移到前面去；但是我却不打算这么干，因为这颇有写小说的意思，那样的话倒还不如另替主人公取个名字，索性胡编一气呢，兴许有点儿意思也未可知。这回照旧是实话实说，跟我十年来写文章的路数一样。但如果换个衡量的尺度，比如说经验，知识，或者思想，大概直到现在“童年”也还没有过去呢，这样似乎就可以打一点儿马虎眼了。此外，即使童年只是时间概念，记忆却是绵延一贯的，很难掐头去尾单单截取那么一段儿，而不牵扯到此后的想法和行事。也就是说，童年只是因，后边还有果（或者没有，好比一朵谎花，开过算是完事），我把这个因果关系写出来，大概和“童年记忆”的本义也不太离谱罢。说来这些都是找辙而已，可是人若不给自己找辙，又能干得成什么事情呢。反正勉强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些了。

话虽是这么说，赶到要动笔了，还是觉得为难。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说现在无论谁都是几岁上小学，几岁上中学，几岁上大学，恐怕难得有早慧者，更别提什么天才了。这话原本与自己无关，可是现在要写这篇东西，觉得似乎除了一笔流水账以外，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话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从前写过《如逝如歌》，其实是一部自传。从一九八七年写起，到一九九三年才告完成，在此之前凡是自个儿觉得有点感触的东西大多写在里面了，倒不如拿这个来顶账呢。只是因为诗的形式，又用了梦窗碧山一路笔法，未免有些晦涩，现在要写也只好给它写本事。但

是人生经历讲起来也就是点到为止，话说多了反而没有意思。末了想起从前写过一段话：“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那么就以这个为主来谈谈罢。虽然十年间以书为题目写过不少文章，该说的话其实也说了不少了，但那都是书评，未免略为严肃，至少书本子要找出来重看一遍，想清楚好坏究竟在哪里。这回则另辟门径，单单凭记忆说话，也就不妨随便些了。所以算是给那几本随笔集子在写本事也行。虽然免不了有记错的地方，可是错误的记忆也是一种记忆。也不是凡记住的都写在这里，有些宁肯忘掉的，我当然不写了。写的主要还是愿意保留的一点记忆罢。也可以说我写的是记忆在这些年里的沉积物或衍生物。可是要声明一句，就是读书我也没怎么特别用过功，只不过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好像显得这个像回事儿了。但是有一条线索在这里，也就由得我跑野马了。现在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至于“正传”是否仍是“闲话”，抑或更“闲”了几分，我就不管了。

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

目 录

序	1
小时读书	1
创作生涯	15
师友之间	32
读小说一	59
读小说二	81
读诗	115
读散文	134
思想问题	155
如逝如歌	169
骊歌	171
月札	179
日札	184
挽歌	191
后记	200
后记之二	204

小时读书

七岁那年，我该上小学了，正赶“文化大革命”兴起，百事俱废，推迟了整整一年才入校。上学后没有语文课本，每天学的是一本《毛主席语录》，当时叫做“红宝书”，可以管所有事情。老师每节课讲一两条，连带认字与学习里面的旨意。《语录》原本不是当教材编的，生字与语法现象并不循由简而繁的顺序出现，现在想来这种课一定颇不容易教，更不容易学。可是两方面似乎也都能够对付。而且此前我在幼儿园里已经认过一些字了。那时还搞“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抄一段语录，次日交给老师，好久我才找着窍门，专挑字数少的，有一条最短，只有两个字：“多思。”抄得次数最多，以致几乎天天都在“多思”了。不记得过了多久才真正有了课本，大概总是两年以后罢，可是课本并没有更多趣味，而我也就沿袭了从前学《语录》的习惯，依然是对付而已。这一直延续到中学毕业，我不再学习语文为止。当年除了《毛主席语录》，还有一册《毛主席诗词》，大概因为形式内容均非浅显，好像不曾当过课本授习，但也是要读的。我开始读古人诗词，即是《卜算子·咏梅》后面所附陆游的那首问题之作（“驿外断桥边”），我也是由此第一次领略中国诗词之美。上

中学后我背诵许多唐人绝句，语文课上不爱听讲，便在课本的空白处默写，一学期下来，几乎都写满了。至于老师所讲的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可以说是不大用心去听的。期中、期末都是开卷考试，可以看课本，一抄就是，无须犯难。上大学学的是医科，根本没有中文课程，所以这方面所受教育，迄今仍然是空白。大学毕业后，有一次得知社科院要办函授课，讲些文学概论之类，我想不如也来补习一下，遂托那里的一位友人代为打听。谁知他反倒说，你没学过这个，正是好事。我由此而打消了重学中文的念头。顺便说一句，《毛泽东选集》四卷很长一段时间是公众必读书，而我由打篇末的注释里学到不少历史方面的知识。我很早就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尤其是中国历史，主要是想知道一些事情，但是这方面的读物一时很难找到。外公家有一本专门解释《毛选》成语典故的书，好像不是正规出版物，我也曾反复翻看。

上面说不喜欢上语文课，这里却也有区别，我可以说的对课本里那些文章始终没有兴趣，尤其是每篇文章几乎一律分做三段，每段都体现一层意思，末了全篇又要总结出所谓中心思想，实在有点儿让人腻味；但是不用说也因十几年的中小学教育而认识不少生字，学到基本的语法知识。只是有一样儿我简直不会，就是作文，这可能与我不爱学习课文也有关系。可是赶上要写作文我却不怕，因为有父亲可以代笔。上中学以后，拢共只有一两篇作文出自我自己之手。我从学校领来题目，跟父亲说几句好话，他一会儿就写成了，交给我时总说让我用自个儿的话重写一遍，其实他已经模仿过我的语气，所以我只抄录在本子上就行了。交给老师之后，父亲很关心得到什么说法。有一位老师姓韩，总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又圈又点，批上“好”或“很好”的字样，末了还要给予满意的评语。父亲看了很高兴。可是韩老师所给的



《伊索寓言》其实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时所作。多数故事均富于生存智慧，虽然不一定就是篇末特意标举出来的那些教训。不知名作者为一四八五年那不勒斯版《伊索寓言》所作插图，集繁复与疏朗、纤细与朴实于一身，正是那一时期版画的风格。



“山羊们吃够了，回家去罢，黄昏星已经升起。”这是古罗马维吉尔的《牧歌》的最后一句。令人感到天地悠悠，苍茫无限；四季运行，无始无终。后世作者，难得如此坦然自在。理查德·西瓦尔德所配插图，很能传达《牧歌》安详宁静的气氛。

分数，却总是“五减”，而不是满分的“五加”，这又让父亲困惑不解。大概老师觉得满分就是到了头了，从此他无须再教，我也无须再学。他哪里知道就中的底细呢。父亲赋闲在家，不能发表作品，但是毕竟手痒，所以也是一桩乐事。

说来很奇怪，父亲希望我有好成绩，我也能做到，每次考试完了，他问我怎样，我总说“还是那个数儿”，也就是一百分了，可是他却不大督促我好好学习。非但如此，甚至时而还鼓动我逃学，为的是一家人好打麻将。当时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父亲看见商店里卖一种算术棋，每副两种颜色，各有一到九个数字，再就是加减乘除和等号，他买了两副，将一种数字涂成别种颜色，当做条饼万，加减乘除当做东西南北，等号当做中发白，就凑成一副麻将，我们常常以此消遣。怕被邻居发现，窗户都用床单挡上，桌上铺着毛毯，可以不出声响。牌很小，字就更小，屋里只点一盏八瓦管灯，昏暗得很，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在每人的牌前放一条白纸，借助反光就勉强看得清了。只是多年不打，有关规则父母已记不齐全。正好军事博物馆举办一个反走私成果展览，其中有副麻将牌，盒盖上印着一套规则，二哥和我在周围转来转去，在心中暗暗记下，回到家里写在纸上。打牌需要四个人，父母之外，姐姐、二哥那时在内蒙插队，一年里总有几个月回家“泡”着，大哥在黑龙江兵团，每年也回来，如果他们不在，就需要我逃学了，这也好办，只须父亲写一张病假条，次日我带到学校就行了。而我正希望如此，说来除了中学最后一年外，学校给我留下的几乎都是不愉快的记忆，哪怕一天不去上课也好。

回到前面的话题，父亲代我写作文，一直到我参加高考。那时他在重庆，拟了几个题目写成文章，寄来让我记熟。我报考的是理科，语文一门只考一篇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正好父亲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内容与此有些接近，我便自己写了

个头儿，三拐两拐引到父亲的意思上，接下去便大半默写他那一篇，结果半小时就交了卷子。我当时所在中学，“文革”前只设初中，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班主任姓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每门考试都在考场外面守候。这回见我早早儿就出来了，还以为交白卷了呢，大为沮丧，我说没事，做完了。这位老师待我最好，至今不能忘怀。父亲最后替我代笔，是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有新生入校，校报叫我写篇东西表示欢迎，我根本写不出这种应景文章，只好又回来求助于父亲，他照例一挥而就，其中引用李白诗句，很是生僻，也就很新鲜了。

我所受的中文教育，实在是乏善可陈，相比之下较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业余阅读方面。我所读的第一部书是《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共有两套，先出的计八册，每册封面颜色不同；后来的修订本好像有十几册，略薄，都是黑色封面。我开始读时大概六岁，以后好几年间一直在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中只有数学与天文两部分还略有记忆。数学是因为其中有些故事非常有趣；天文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门类。动物园西边有个天文馆，母亲曾带我去过几次，实在是儿时最难忘的一番经历。仰望着巨大的圆顶，四周忽然变得漆黑一片，人立刻兴奋起来，接着星星就陆续出现了，什么北斗星，北极星，牛郎，织女，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等等。多少年来我一直向往当时情景。后来倒有两次看见了当年天文馆里模拟过的那个星空，一次是一九九六年，在法国大西洋边，独自在石堤上坐了很久；另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在印尼的巴厘岛，和一位同事接连几晚去沙滩，仰卧在躺椅上，四下里都是潮声。这时我真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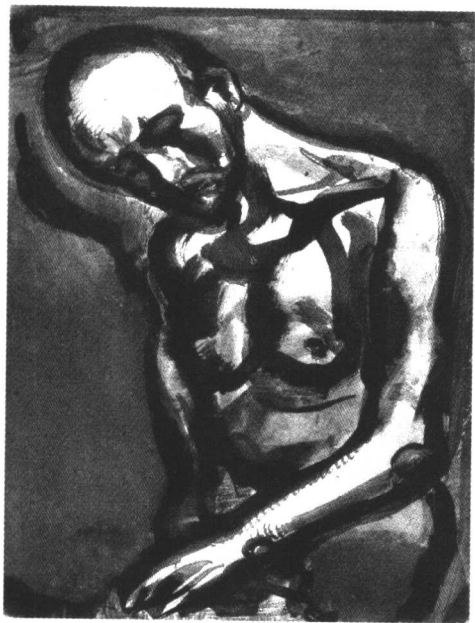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早晨，街道主任来对母亲说，红卫兵就要来了，你们自己先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违禁之物。于是一家人忙成一团，撕碎照片，砸坏唱片，剁掉高跟鞋的跟儿，扯烂

旗袍连衣裙等。检查父亲的藏书也是重头戏，但是谁都不知道除了马、恩、列、斯、毛，还有什么应该留下。母亲忽然想到鲁迅，于是大家赶紧从已经打算交给红卫兵抄走的一大堆书里去找他的著作。那是一套一九四六年版的《鲁迅全集》。把外面的封套扯下，露出精装的红布面。手忙脚乱之际，遗漏了一册“补遗”，只留下正文二十卷和“补遗续编”。不知怎么我的两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几本小说却留下了，也许是母亲特地保留给我的读物罢。此外只有一套《瞿秋白文集》，共四卷，此前恰好被教二哥小学朱老师借走，过后还回，也成了漏网之鱼。家中别的藏书，都被同时来抄家的两批红卫兵拉走了。曹靖华住在我家对门，大概也有藏书一并抄走。反正整整装了一大卡车。后来在附近一所中学的操场上，与别处抄来的书一起放火烧掉了。我当时还小，根本不知道家里都有什么藏书，以后父亲从黑龙江回来，一再对我说其中有两套最可珍贵，其一是《六一诗话》之后的全部诗话，其一是《尝试集》之后的全部新诗集，都是他多年精心收集，打算研究用的。

剩下的那几本书，就是我以后多年间的读物。其中鲁迅与瞿秋白两种，不是小孩子所能够读的，所以这里不谈。有一部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写得很热闹，但好像只此而已，别无意思。相比之下几本苏联小说倒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包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盖达尔选集》、《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和《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等。前两种是英雄故事，不算特别有趣。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所谓名著了，可是连同《鲁迅全集》里同一作者的一部《毁灭》，我都是分几次好不容易才读完的，《毁灭》留待将来再说，《青年近卫军》只有袭击德军司令部那一段记得清楚，再就是有一位刘芭性格活泼，与众不同，我还由此得知俄国人名有不同称呼方法，

比如刘芭又可以叫做刘勃卡之类。以后我在中学学过几年俄语，讲到这个内容时，不免会心一笑。我最喜欢的是《盖达尔选集》。我是不大相信个人记忆尤其是童年记忆的，尤其不愿意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盖达尔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及，虽然大家都喜欢“怀旧”，可是也没有他的份儿，我还是觉得奇怪，这位作家总不至于就这样被遗忘罢。他的选集共有两卷，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少年鼓手的遭遇》、《学校》和《铁木尔和他的队伍》，都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是少年儿童的真切感受，很是引人入胜，虽反复阅读亦不感厌倦。另外两本已经忘了作者姓名的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很有光亮，《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则色调略暗，都写的和平生活，其中种种烦恼和快乐，都是我的实在生活中所完全缺乏的。举一个例，《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写到训练小狗方法，说狗并不认字，展示一个数字给它，便一声声叫下去，只须在合适时机悄悄打个框子，遂即停止，大家便觉得狗会数数了。这类事情，岂是当年黯淡乏味的岁月里我所能想象的呢。我那时候有点儿孤僻，找不到愿意和我一起玩的伙伴，那么马列耶夫、瓦肖克和《学校》的主人公鲍里斯·戈利科夫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了。而他们对于我的意义还不限于此。瓦肖克比马列耶夫年龄要大一些，经历也就不同，二者正可相互接续；再加上盖达尔笔下那些人物，他们可能比我自己更是真实的我也未可知，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替我制造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遗憾的是收有《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的《盖达尔选集》下卷，后来不知怎么遗失了，从此铁木尔就给我留下一个不辞而别的朋友的记忆。

这类书中另外一些则读得较晚，譬如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那是我刚上初中时的重要读物，可是我已经不像对待上面提到的几种书那样，以一种仿同心理去读它了，只是想怎么不曾遇见像



乔治·路阿被视为“现代世界少有的权威性宗教画家”，在他以基督受难为题材的绘画和为《诗篇第五十一首》所作的蚀版画中，充分体现出一种包容苦难的慈悲胸怀。《现代艺术史》说：“艺术家在他那深深理解的基督教信仰里，仿佛看到了依然面对周围邪恶的受难人类的希望。”



卜伽丘的《十日谈》从一场瘟疫写起，不过作者强调这只是“暂时的凄凉”，“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片欢乐”。其中的故事，也以描述欢乐的内容居多。《十日谈》是一本畅所欲言的书，正是文艺复兴气象所在。马克·哈舒伯格为一九四八年美国袖珍版所作这幅插图，乃是第九天的第一个故事，写一个聪明的女人如何摆脱追求她的两个愚蠢的男人。画面生动诙谐，恰与卜伽丘的意趣相当。